

主编 梁自洁

· 山东 · 现代 ·

著名社会科学家传



山东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山东现代

著名社会科学家传

2

山东教育出版社

鲁新登字 2 号

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

第二集

梁自洁 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5 插页 390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28—1568—4/Z·51

定价 8.5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任:张全景

副主任:李文全 梁自洁

委员:郭庆惠

吕秀卿

林 诚

闫培智

主 编:梁自洁

副主编:吕秀卿

郭庆惠

目 录

路大荒	(1)
王献唐	(14)
黄嘉德	(36)
庄维石	(51)
李书厢	(65)
鲍兆宁	(82)
陶愚川	(93)
徐 杰	(105)
李季平	(121)
关德栋	(137)
朱 活	(151)
季星如	(170)
黄冕堂	(179)
张文杰	(196)
徐经泽	(226)
林白鹏	(243)
于首奎	(273)
庄德钧	(292)

张 明	(298)
高更生	(310)
袁世硕	(328)
臧乐源	(339)
周来祥	(356)
刘乃昌	(378)
张学惠	(395)
乔 伟	(412)
赵明义	(428)
李衍柱	(442)
刘蔚华	(459)
朱德发	(479)
李庆臻	(497)
张志毅	(519)
郭延礼	(536)
编后絮语	梁自洁(554)

路 大 荒

路大荒先生以研究蒲松龄生平、著作闻名于世。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蒲学研究事业，为蒲氏著作的收集、整理、鉴定、研究、出版和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蒲氏故里成长

(1895年—1919年)

路大荒(1895—1972)，原名鸿藻，字笠生、笠僧、丽生，曾用名爱范，号大荒，别号大荒山人、大荒堂主人、留仙同里人等。山东省淄川县菜园村(今淄博市淄川区)人。

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曾祖父名希周，号蔬村，习岐黄之术，常为乡人治病；喜爱书法、绘画、藏书，能鉴别古代文物。祖父名风舞，爱好古典文学与文物考古，并精于绘画。祖辈的文化素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先生的成长。父宗轼早逝，随寡母生活。17岁时因叔父宗辙无子，遂出嗣叔家。这年春天，先生与菜园村东五里村贤淑勤劳的李氏清顺结婚，生三子二女，长子士川，次子士湘，三子士汉，长女士兰，次女士芸。

先生读书勤奋，学习兴趣广泛，尤喜读蒲松龄著作。7岁入私塾求学，蒙师是蒲松龄同族后裔老秀才蒲国政，除循例念古籍启蒙课本外，还念一些蒲松龄的诗词文章、《聊斋志异》选篇及俚曲。年稍长，转入淄川县城王东生先生的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

考入淄川高等小学堂。1912年，入周村的私立政法专门学校学习两年。19岁时，回到淄川，在城内南市小学任教员。21岁时，又入私塾读国学古籍一年。1917年，先生22岁时，入淄川师范讲习所进修一年。路先生因多次入私塾求学，获得了丰富的古典文学知识。当时当地相当广泛地流传着蒲松龄的多种版本著作和蒲氏生平事迹的许多传说，为蒲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优越条件。特别是先生就学于蒲国政老先生，常听讲解蒲松龄的诗词，从对蒲氏著作产生了浓烈兴趣。王东生老师家藏图书甚多，其中又有不少《聊斋志异》抄本和蒲松龄诗文稿本，使路先生初步获得了蒲氏著作的版本知识。城内学友收藏蒲氏著作者比乡村多，先生常通过同学或亲友借阅，随阅随抄，遇有不同版本，即校比同异并作记录，开始了蒲松龄著作的研究。

先生青年时代曾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家庭处境与个人学习、就业及政治思想方面都留有不少时代的烙印。例如：夫人李氏的祖父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淄川刘德培领导的反抗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战败后，义军及家属惨遭清军灭绝人性的屠杀，李氏的祖父虽侥幸突围逃往外地，但长期不敢回家。日、德帝国主义者侵略山东，以掠夺淄川的丰富矿藏为主要目标，先生耳闻目睹了家乡人民遭受的残酷剥削与压迫，面对这些民族的屈辱与国难家仇，激发了爱国热情，勇敢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5年12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宣布次年改年号为洪宪，准备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全国各地纷纷组织讨袁军队，先生遂于1916年5月到周村参加了救国军。

《聊斋全集》与《蒲柳泉先生年谱》问世

(1920年—193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日寇蚕食山东。翌年发生济南五三惨案，日军进占淄川，先生不得不逃亡外地。1929年春，日军撤离后，先生秋天才回家，就任淄川县立体育场场长。该场改属淄川县立民众教育馆后，任体育部主任，直到1937年末。此间，曾先后兼任淄川戒烟所所长、淄川中学书法指导员、淄川师范体育教员和重修淄川县志委员会金石门编辑等多种职务。先生常与当地古董商人交谈，并通过共同鉴赏文物熟悉了古玩与古书的鉴定方法。在此期间，他倾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从事蒲松龄著作与生平的研究，于1936年出版了他主持编辑的《聊斋全集》（下简称《全集》）与撰写的《蒲柳泉先生年谱》（下简称《年谱》）。

从先生所著《整理蒲松龄诗文杂著俚曲的经过》一文中，可略见他开始搜集、研究蒲著的端倪，如该文提到：“我自幼年代，每听到长者讲说聊斋故事……都感到有很浓厚的兴趣。及年龄稍长，遂事收集蒲氏的遗著。”先生首次购得蒲氏手稿的喜悦心情，记录在手书《贷钱典衣购〈聊斋文集手稿〉记》中：“……丹铅涂沫，古趣盎然，仿佛犹见先生伏案挥毫也……得英奇之可宝，感良友之多情，不能寐者又数宵矣……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存如我之痴情耶乎？”在日寇盘踞淄川时期，不少蒲松龄著作被日本人强行运往日本，先生无力与之抗争，常引以为憾。先生为遍求蒲氏遗著，常奔波于淄川城乡，或远到周村、章丘等地，访亲问友，或流览书市，家藏蒲氏著作日益丰富。其中有价购者，也有亲友赠送者，如淄川王东生老先生见他有志于蒲学

研究,就把自藏三册《蒲松龄诗集》赠给他。先生还用借抄的方法积累资料,如从淄川天山阁主人王敬铸及其弟王敬铎家借书抄写,其中就有编辑《全集》所用的底本,如《聊斋遗集》及《同治己巳抄本》等书。又如从同邑冯荻秋编《般阳诗萃》中选辑蒲松龄诗作,抄写成册。遇到有关的碑刻载文,则拓印并装裱保存。先生虽对收藏的资料爱不释手,但遇有来索借者,多慨然应允,或抄赠借阅而不独占。先生曾把张元撰《柳泉先生墓表》拓片寄赠胡适,胡适为此墓表写一跋文并发表在《益世报·读书周刊》上。于是四方友好来求索拓片者甚多,先生不辞辛苦一一应允。编辑《全集》所用资料保存到建国以后者,尚有 17 种 39 册之多,在抗日战争时散佚者,难计其数。

《全集》初版前,先生已在报刊上发表研究蒲学的论文。1933 年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了他注释的《聊斋外书·磨难曲》,引起学术界与出版界的注意。经文物考古专家王献唐先生向上海世界书局推荐,先生把编写的蒲氏遗著与年谱的稿本寄送该书局。书局编辑赵苕狂把先生的稿本与《聊斋志异》及《醒世姻缘》汇合为一部四册的巨著,题书名为《聊斋全集》,题编者名为路大荒、赵苕狂。先生对这种编排事前并不知道,尤其不同意将《醒世姻缘》编入《全集》,因为经先生研究考证,该书作者不是蒲松龄。赵编辑却依据胡适的推论,当作蒲著而编入《全集》。此事直到 22 年后,先生在 1955 年 9 月 4 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发表《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才得以说明原委。瑕不掩瑜,《全集》第一、二两册所收先生编辑的年谱与诗文杂著俚曲等,仍受到读者的好评。

《全集》出版前曾有多种蒲松龄诗文集刊本发行,如 1893 年刊耿士伟编《聊斋先生遗集》,1908 年扶轮社抽印耿本而成的

《聊斋词集》，1929年北京朴社刊行的马立勋编《聊斋白话韵文》等，但均欠完备，遗漏甚多。《全集》所辑则多达六十万字，而且集各种体裁于一书，因而被认为是使用最方便而内容最丰富的蒲氏遗著本，为蒲学研究提供了方便，拓宽了道路。

先生治学严谨而谦虚，不时向学者、同行及挚友求教。他把新发现的张元撰《柳泉先生墓表》拓印寄给胡适，胡适既赞扬他热心治学的勤奋精神，又指出拓片上文字不全的问题。从《年谱》三稿附录胡适为《墓表》所写跋文可知其详：《此碑……的拓本每行底下缺四个字，大概是埋在泥土中了。所以我请他把泥土挖开，再拓一份。……正当十二月寒冷的天气……蜡墨都不能用，往返四次，才勉强拓成。他的热心使我们今日得读此碑的全文，得知蒲松龄的事实，得解决许多校勘和考据的疑难，这是我最感激的。”

《全集》中的《年谱》依时序阐述与论证蒲松龄生平及著作，谱文前述祖籍迁次，谱文后附《蒲氏世系表》及行述、墓表等有关资料。在凡例中，先说明编撰主旨：“古云诵其诗，读其文，不知其人可乎？”可见《年谱》是为研读蒲氏著作而编。《年谱》的突出特点是以阐述蒲氏的著作为主，据实论证一诗一文的写作时间与地点、动机与背景、有关人物与事体。《年谱》大量引用了各类文献，包括明清史传、地方志书、族谱年谱、聊斋诗文、信札，广及有关人物的各类著作。《年谱》以时间为序，以著作为纲，实际上已成为蒲氏主要著作编年目录。而目录之学向称读书治学入门之学，先生的目录学理论造诣亦深，又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专家，在《年谱》中也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目录学特点。

关于《年谱》的写作始于何时，甚难推断，对成稿的时间也说法不一致，有说始于1932年；有说在1933年到1934年间；有说

约始于二十年代。现存的《年谱》第三稿稿本可以提供成稿的准确时间,在此本封面上有先生亲笔题签:“蒲柳泉先生年谱 第三次改定稿 廿五年六月卅日”,其廿五年即1936年。封面上还有亲笔题写:“目录五页 世系三页”,“二万五千字”。

“不惑”后的拼搏与动荡中的追求

(1938年—1948年)

1937年12月27日,日本侵略军进据淄川县城。先生在淄川沦陷前夕,随旧县府逃亡,在当地山区迂回躲藏,敌伪邀他出山,立即回绝,遂遭通缉,并广贴告示,限期归案,先生坚不屈从,时年43岁。1938年农历3月,日伪到菜园村路家搜查,先掠去衣物古书,后将房舍放火烧光,家人四散流亡,先生也从山区潜往济南。因《全集》出版后,人们遂知路家有不少藏书。先生离家前,已委托常在身边的学生张懋功,就近将蒲著的抄本,转移到张的岳父田明广老人的家中藏匿,自己则将贷钱典衣购得的《聊斋文集手稿》随身带走。火烧路家后,日军头目水鼓仍四处搜查先生的藏书,捕风捉影地追查到田明广老人家,田老人拒不承认有路家的存书,竟被水鼓枪杀。以后,先生一见到田老人代存的藏书,就悲愤难止,总想着只有在蒲学研究上做出成绩,才能不辜负田老人的深重恩情。先生认为1962年《蒲松龄集》的出版,田明广老人应居首功。

先生到济南后,为避敌伪迫害,改用路爱范为名,寄居秋柳园表弟高梦周家,继续蒲氏著作的收集与研究。先生的《戊寅历下杂记》(戊寅是1938年)中,记述了身处困境中的蒲学研究情况,如:这年重九前一日,他同友人李振华、罗锦章在曲水亭附近

的聚古斋“见有《聊斋文集》六册而索价甚昂，以囊空空如我，何能获之，即假归。灯下抄其篇目及首卷序题三篇，末卷诗四首，俟异日与我烬余者一较。抄毕，时钟已报三响矣。”还有记述购得宋眉山刻《宋书》残本的心情：“只身漂零，一息尚存，旧嗜仍未能除……观此帙，即缩两月之费收之。余家人嘲我邈遇，今竟与是帙相遇，物以类聚，其信然欤。……锦章知我装书乏资，自以由燕市选购之佳纸为我补缀装钉，护书如锦章者，异日书林当又添一段佳话。……舌耕无力，寄食亲友，古籍一时臻至，上苍又何待之独厚，然终不能释我生不逢晨之憾尔。”

1939年初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前，先生时以鬻字卖画或做古董生意谋生，收入无保障，生活常拮据，但始终坚持不就日伪职务，宁忍受贫困而不丧失民族气节。

从1946年9月到1948年9月，由前任山东省图书馆王献唐馆长推荐，先生到省馆任特藏部主任，主要承担有关馆藏金石的业务，也时而参与古籍善本方面的业务。这段时间的省馆开展业务是举步维艰的，经费严重不足，有时甚至不能按时发给员工薪金，购书费更无着落。馆舍本来狭窄陈旧，又被驻济蒋军征作行辕，后又充作兵站存放军械弹药，成为军事重地，禁止读者入馆，员工也要凭证出入。这样尴尬的局面，直到济南解放才根本改变。

先生某次到章丘访书，偶然发现清代泰山真合斋徐志定磁版印行的《蒿庵闲话》下册，遂介购带回济南。先生将该书送给王献唐观赏，王即取出家藏的一册《蒿庵闲话》对比，结果令人异常欣喜，王家的一册是上册，同属真合斋磁版，而且两册的书型开本与印纸色度及边角磨损痕迹完全吻合，竟然是原属同一部书的上下两册散后复合。王遂在该书上亲笔题记，记述路先生访书

购书的简况。泰山真合斋磁版印书种数不详，从现存实物知道仅有两种，除《蒿庵闲话》外，另一种是《周易说略》。两书同为清代经学家济阳张尔岐所著，可惜《周易说略》已外流日本，国内仅存《蒿庵闲话》。到六十年代初，济南古旧书店出售古籍中，不时有王献唐藏书出现，先生为省图书馆购得其中的《蒿庵闲话》上下册，后被调送北京图书馆。从上述几件得到善本古书的情景看，情似偶然，实非偶然，是因先生能鉴定版本，对地方文献尤为谙练，以保存、发扬文化学为己任，才见好书而不失之交臂，缩食贷钱典衣买到手，逃亡时也随身携带蒲氏手稿，决意与蒲书共存亡。正如先生在《聊斋文集手稿》题记所说：“……尚恋之一书，人间尚存如我之痴情耶乎？”事实证明痴情的追求，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果实。

《蒲松龄集》与单行本《蒲松龄年谱》出版

（1948年9月——1972年6月）

1948年9月14日济南解放，年已53岁的路先生从此有了安定的生活，蒲学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党与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先生参加革命后，仍在省图书馆工作，被任命为山东省图书馆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副馆长兼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0年后，调去该文物管理委员会任专职委员。曾任山东省第三届政协委员、山东作家协会理事、蒲松龄故居整修委员会委员。1959年秋，因省图书馆亟需版本学专家，又被调回该馆，主持古籍善本的选购鉴定与整理工作。1962年6月9日应邀出席省出版局召开的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被推选为该会兼职副主任。先生积极参加对外文化交流的书画展览。同外国蒲

学专家交换研究成果。总之，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余生的才智和专长全部奉献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一直追求的蒲学研究的理想才得以实现。1960年国庆时，先生收到政府赠送的节日礼物，深受感动，便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写到：“……心里感到在馆没有什么工作成绩，受此优厚的福利，很惭愧，很感动。”1962年《蒲松龄集》出版后，先生为表示诚挚的感激心情，毅然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连同另一善本献给省图书馆，受到省馆的嘉奖。

先生自编的《蒲松龄集》（下简称《蒲集》）于1962年8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2月再次印刷，全书一百二十多万字。1963年6月出第2版，实为增订本，约增加七千字。《蒲集》的出版，使他得以消除《全集》混入不属蒲氏著作的遗憾。在《整理蒲松龄诗文杂著俚曲的经过》（载《蒲松龄年谱》附录）一文的前言中，有记述：“在一九五三年的冬月，中央文化部周扬同志因公来到济南，嘱我继续搜集、整理和研究蒲氏的遗著，并将以前所编的《聊斋全集》重新修订。这……使我认识到党和政府对于祖国有价值的文学遗产的重视。我在心情愉快下，把多年束之高阁的东西重新拾起来，加以整理。”当时，省文化局王统照局长，也非常重视路大荒先生的研究工作，并给予鼓励与具体的帮助。王局长在上海开会因急病住院治疗仍及时来信催问：“修葺蒲氏故居与抄写的遗著”是否“告一段落”？王局长辗转从北京图书馆借到蒲著立即转交给他，后又来信说：“昨转送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蒲氏诗文集一大包……内附该社对编订蒲氏诗文……之意见，我细看过，以为所提诸项颇为中肯。总之，目录宜清刊，体例宜划一，俗曲审定是否宜有强力佐证……如何装置蒲氏故居并添木器等事，不宜再延。”《蒲集》原已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后

因出版社分工调整,改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两出版社都曾对他的蒲学研究工作提供过很多帮助。如西安新发现一部《柳泉居士词稿》,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得到这信息,便将该词稿抄录一册寄来;中华书局胡道静先生曾将日本天野元之助博士委托转交路先生的天野新著《清蒲松龄农桑经考》转来,并分别转告了他们的通讯地址。先生还得到青岛崔介寄来的抄自北京图书馆藏的《聊斋诗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都曾将蒲著抄本借给他。此外,还曾得到作家、学者如陶钝、张友鹤、王献唐、商承祚、容庚、溥儒等个人的支持与鼓励。总之,《蒲集》的出版,确实得到了从领导到友人的广泛鼓励与支持。当然,更重要的是先生从事蒲学研究的坚毅决心。1962年他为《聊斋文集手稿》写一跋文,文中写到:“余以为辑先哲遗文,为后生之责,即不畏困难,下决心担起此项任务。”可见,先生把这一专题研究当作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追求个人名利。这时先生已是67岁的老人了。

先生亲自编辑的《蒲集》是以《全集》出版后二十多年来收藏的蒲著和借自几个图书馆的蒲著为蓝本,结合对蒲著研究的新成果,把蒲氏遗著重新予以整理,校订核比,删讹补阙,并依次分为文、诗、词、杂著、戏、俚曲、附录、年谱八部分。有关整理工作的细节,已写成“编订后记”,附在《蒲集》书末。那部被先生早已认为不属于蒲著的《醒世姻缘》,当然不予收录。先生在《蒲集》出版后,并未认为这部书是完善的,他在自存的一册《蒲集》第1版第2次印刷的下册末页写下朱笔题记:“……在整理校勘方面仍有很大的缺点,在搜集上,诗还有几百首没有见到,杂著、俚曲亦均各有缺,今后当再努力。”中华书局在1963年6月出增订本时,先生又增加七千字。1986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蒲

集》新1版,这已是先生去世十余年之事了。

先生自撰的蒲松龄的年谱,在1980年以前,一直是题名《蒲柳泉先生年谱》,作为附录编入《全集》或《蒲集》,并无单行本问世。前任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后来主持齐鲁书社编辑工作的赵炳南先生等,早对先生的蒲学研究给予过鼓励与支持,准备为蒲学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方便。六十年代前后,他们曾亲去路先生家访问并听取意见。其中就酝酿过为方便读者而出版《年谱》单行本的计划,不幸1966年因文革中断了十余年,到1980年8月才由齐鲁书社出版了题名《蒲松龄年谱》单行本的第1版,1986年8月该社又出了第2版。《蒲谱》与《年谱》相比:其一,《蒲谱》是先生去世前修改《年谱》而成的新稿;其二,增入先生次子路士湘遵父遗嘱整理的《蒲松龄年谱补遗》6页;其三,第1版附录先生的蒲学研究论文11篇,第2版再增《贷钱典衣购聊斋文集手稿记》1篇。

先生的蒲学研究在国外也获得了好评,为弘扬祖国文化做出了贡献。前文提到的日本天野博氏认为先生是“当今研究蒲氏著作的第一位”;日本蒲学研究者与画家高山朝阳在与先生学术交流之余,还曾为先生绘画《大荒堂著书图》一幅。捷著名汉学家普实克不仅与先生通讯交流研究成果,还在六十年代初两次来山东访问。路家现存普实克来信可以说明他们交往的情况,如普实克1961年3月2日来信中说:“很希望能够重温和您在一起度过的美好但短暂的日子。前次寄上有关蒲氏生平的一篇短文……”;1962年11月12日普氏来信说:“非常感谢您寄赠的三部《蒲松龄集》共六册,已转赠丽沙娃和发思同志(二人都是汉学研究者)各一部二册。”

先生的书法、绘画、版本鉴定等才能,在新中国才得到施展